

# 第一章：从孤立的文本假说到社会历史的考察

——早期文本假说和威尔浩生的历史批评

成祖明 南京大学

## 一、早期对五经文本的质疑与回应

对圣经正典文本形成的问题，在古代一直没有专门性研究和著述，多散见于其他著述中，如耶柔米（Jerome 347-420）的旧约译本的《绪言》、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教义》等。在耶柔米的言语中似乎对摩西做五经已有质疑，暗示为以斯拉所为。耶柔米认为，五经文本在经历了耶路撒冷被毁时亦一同被毁，而是由以斯拉在圣灵的感动下逐字逐句修复。十一世纪以撒·本·撒母耳（Isaac ben Samuel 1050-1130）认为创世记 36 章的内容要比摩西晚的多。十二世纪的犹太拉比阿本·以斯拉（Aben Ezra）则进一步质疑五经一些词句无解释，如“约旦河外（Beyond of Jordan）”（申：1：1），“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申 31：9），“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创 12：6），“在耶和华的山上将被看见”（创 22：14），还有《申命记》3 章 11 节关于巴珊王噩铁床的描述，这些都应是后人的添改。但同时本·以斯拉欲言又止：

“迦南人那时住在那个地方：看来诺亚的孙子迦南从别人的手里夺取了土地，即以他的名字为名。若是原来的意思不是如此，在这段中就隐然有一些不可思议。对于这个不可思议有所解的人以保持憾默为是。”<sup>1</sup>

可见，古代学者多迫于教会的压力或囿于传统的“字句灵感说”，对正典文本形成问题虽有疑问，但一直未能形成科学的研究。

科学的圣经研究直到启蒙运动时期与唯理主义时期才真正开始。<sup>2</sup> 1651 年霍布斯（Thomas Hobbes）其作品《利未坦》（Leviathan）问世，对圣经各卷的作者提出了怀疑。对于《摩西五经》，他说：

这五书称为《摩西五书》并不足以说明它们是摩西写的。正好像《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得记》和《列王记》不能作为充分的论据，说明它们是约书亚。各士师、路得和列王所写的一样。因为篇章的名称标明主题的和标明作者同样常见。……我们在《申命记》最后一章第六节中读到关于摩西的坟墓有这样一段话：“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所谓到今日，包括的是到写这句话的时候。因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这话是在他埋葬以后写的。因为我们如果说摩西谈到自己的坟墓时竟然讲：到他还活着的时候仍然没有找到，这话即使是用预言的方式讲的，也是一种奇怪的解释。……所以我们就

<sup>1</sup> 转自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出版社，1963 年，第 131 页。

<sup>2</sup> 阿多·韦瑟《旧约导论》，颜路裔、古乐人译，香港：道声出版社，1998 年，第 2 页。

可以看十分明显《摩西五书》是在他的时代以后写的，只是以后多久却不那么清楚。<sup>3</sup>同时，霍布斯认为，摩西在不同时间中写了律法，这些律法的汇集和历史部分叙述则是由别人来完成，而整本书的修定最终则是由以斯拉完成，之所以称为摩西的书，主要是因为摩西创作了全书的主要内容。<sup>4</sup>

1670 年，斯宾诺莎（Spinoza 1632-1677）匿名出版了《神学政治论》。该书吸收、总结先前学者对五经的批评，并有新的发现。如“但”作为地名，一直到士师时代才出现，而非在摩西时代（创 14: 14，见士 18: 29）；“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在以东地作王的”（创 36:31）；“以色列人吃吗哪共四十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出 16:35）；“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民 12:3）；还有摩西被提到的时候总是用第三人称，关于摩西许多情形都说的详细明确等。根据以上所见，斯宾诺莎最后做出了一个大胆论断：“《摩西五书》不是摩西写的，而是出自远在摩西之后的一个什么人的手笔，这是比午时的太阳更为明白的了。”<sup>5</sup>霍布斯、斯宾诺莎之后，在圣经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专门学问——圣经批评学（Biblical Criticism）。

李·克雷（Le Clerc 1657-1736）通过对圣经文本的线索，最初认为五经是亚述王所差的教化以色列地异族的撒玛利亚祭司所为（王下 27: 26）。不过，他后来放弃了这一推断，而是进一步申论五经非摩西所作，是由在迦勒底（Chaldea，即两河流域巴比伦一带）的一位作者所作。他的理由是五经中有大量迦勒底地的记述，如“伊甸园的故事”，“巴比伦和尼尼微城的兴起”（创 10: 8），“迦勒底的吾尔”（创 11: 28, 31），巴比伦的“以得塔”（创 35: 21，见弥 4: 8）“Hebron（希伯伦）”（创 13: 18，书 14: 5）“希伯来入之地”（创 40: 15），“先知”一词（创 20: 7；撒下 9: 9），这些术语都产生摩西以后的时代，并且他还解释的摩西与亚伦的关系，俄梅珥容量，这些都是与迦勒底地区密切相关，是当时的流行的词汇。<sup>6</sup>可以说，李·克雷是五经“成书流放时期说”最早提出者之一，这一说法对后世五经成书学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对于以上种种质疑，力主五经为摩西所作者也给予了辩护。卡普诺（Carpzov 1679-1767）认为，“约旦河外（Beyond of Jordan）”，仅表明摩西在约旦河东，并不表明作者在迦南地，这可从五经的其他类似的记载中明证。在《民数记》32 章 19 节经文首次使用约旦河东和约旦河西，<sup>7</sup>在其他地方则用作“Beyond of Jordan eastward（约旦河以东）”（申 4: 47, 49；书 1: 15；12: 1；13: 8, 27, 32）和“Beyond of Jordan westward（约旦河以西）”（申 31: 30；书 5: 1；12: 7；22: 7）；类似的用法还有直接用“the east of Jordan（约旦河东）”（申 3: 8）和“the west of Jordan（约旦河西）”（申 3: 20, 25）。由这些经文可见，“约旦河外”在当时并非一个时间处境的概念，仅表明以色列人所处的位置。“那时迦南人

<sup>3</sup>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出版社，1985 年，第 297-298 页。

<sup>4</sup> 同上，第 298-299 页。

<sup>5</sup>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出版社，1963 年，第 134 页。

<sup>6</sup> *Sentimens de quelques Theologiens de Hollande*, 1685, p.126.

<sup>7</sup> 民 32:19：“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西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

住在那地”（创 12:6），只是对亚伯拉罕时代的事实陈述，并不能得出五经成书时迦南人已不住在那里。“在耶和华的山上将被看见”，也不隐含写这句话的时代耶和华是在圣殿中显现。巴珊王噩铁床，亦不是作为先前时代的遗物，而是作为最近战争胜利的纪念物。而《耶和华战记》，毫无疑问，是当时的作品，是对耶和华大能帮助下的胜利的记述，以此来庆祝纪念胜利。“直到今日”被很多学者认为是后代人的补述，但这一假定亦是没有任何必要的，因为即使仅数月过去后，它都已成记忆，当再次被提到时都可说“直到今日”。没有证据表明《创世记》14 章 14 节中的“但”即是《士师记》18 章 29 节中“但”；即使是同一地名，也没有多少困难，因为在文本传抄过程中用一个大家熟悉的代替一个陌生的地名也是经常的出现的事。抑有进者，即使一个或数个片段可能是后摩西时代的人所为，卡普诺认为，这也仅能说明这个或这些片段不属于五经，而是由后人补入其中，并不能影响五经整体属于摩西所作的事实。<sup>8</sup>

总之，围绕五经文本的形成和作者的问题，启蒙运动以后，讨论已是一发而不可收。在正反两方面的相互角力与抗辩中也越发的深入和细腻，并从早期的单纯质疑，发展到深入的文本理论的探讨，各种文本假说相继产生，大大推动了五经研究的发展。

## 二、各种文本假说与争论

### 1. 旧文献底本说（Document Hypothesis）

这一假说最早是为维护五经作者摩西的权威。在对五经成书的质疑中，捍卫摩西的权威的学者发现，承认摩西以前有不同的文献来源与五经为摩西作者并不矛盾。他们认为，在摩西以前有许多关于先祖和远古的文献记载，摩西在准备编撰《创世记》中利用了这些记录。这一观点，在 1707 年被一位杰出的正统神学家维瑞哥（Vitranga 1659-1722）所表达。他的主要兴趣在《创世记》的可靠性，他认为摩西收集、消化、修饰和补充这些先祖和以色列民中保留的记录。摩西通过这些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设计出《创世记》的结构，对这些资料进行简单的处理与缝合，以至于这些资料都保留了它原来的特点和内容，从中暗示了其资料来源。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将《创世记》不同来源文献进行分离和重新组合。这一想法在 1753 年，被一位法国医生让·阿斯楚克（Jean Astruc 1684-1766），在其论文《关于摩西编写〈创世记〉所用原始文献的推论》（“Conjectures Concerning the Original Memoranda which it appears Moses used to Compose the Book of Genesis”）中提了出来。阿斯楚克认为《创世记》有两个最主要文献组成，一是伊罗欣（Elohim）文献，一是耶和华文献（Yehovah）。此外还有一些小的文献，主要是记述外民族的文献，在这些文献中没有上帝的名字。这一假说被哥廷根大学杰出的东方学教授艾希霍恩（Johann Gottfried Eichhorn 1758-1827）采纳和完善，并在他的鼓吹下，这一假说风行一时。这一假说的要点如下：

1) 支持这一假说的首要基础是上帝的名称“伊罗欣”与“耶和华”的不同，尤其是在

---

<sup>8</sup> 以上参见，William Henry Green *The Higher Criticism of The Pentateuch*,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6, P50-60

《创世记》中。有的地方整段整段地单独使用“伊罗欣”，有的地方则使用“耶和华”，有的地方则交替使用。例如在《创世记》1: 1-2: 3 节，伊罗欣几乎出现在每一节。但是在《创世记》2: 4-3: 24 节，除少数几处“耶和华”“伊罗欣”连用外，几乎都使用“耶和华”，4 章亦然。到了第 5 章“伊罗欣”再次出现，6 章 1-8 节，则使用耶和华，其他部分则使用“伊罗欣”。其他章节亦较类似。阿斯楚克认为，这是不同作者的特点造成的，当提到上帝的时候，有的作者习惯使用“伊罗欣”，有的作者“耶和华”。阿斯楚克将所有单独使用或主要使用“伊罗欣”的段落分别归属于“伊罗欣”作者文献，其他的段落则归属于“耶和华”作者文献。这两部分文献由于不同人群的偏好在不同地域各自独立存在和流传，最后被整合起来，形成目前的状况。这一假设由此被称为“文献资料说”(Document Hypothesis)。由于支持这一假说最主要的证据是上帝名称的交替使用，因此，不同的上帝名称便成了不同文献资料来源的标准。

2) 支持这一假说的证据还表现在，将所有“伊罗欣”文献部分从圣经中抽出，放在一起，它们形成了一个连续的完整的叙事，甚至看不到中断和裂隙；它们构成了一个与耶和华文献不同的完整文献。同样的方法，尽管看上去有些勉强，将“耶和华”文献抽出放在一起，也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文献。

3) 这两部分文献中存在一些平行重复的叙事。相同的事件在《创世记》中被重复叙述。一次在“伊罗欣”文献中，一处则在“耶和华”文献中被修改或变化后叙述。这表明《创世记》不是一个连续的叙事，而是由两个不同在历史叙事构成。圣经编纂者没有将它们打碎进行重新整合，重新叙事，而是整体保留了原来叙事，首先以一个文献为底本，将另一个文献的相关部分插入其中。例如，在《创世记》1: 1-2: 3 节中，“伊罗欣”文献作者叙述了创造的内容，叙述了世界怎么创造，动植物和人类怎样形成。但在创 2: 4 以下则以另一种方式叙述了男人和女人，陆地的果树、动物的创造。这些令人不解的叙述表明，它们并非由单一作者完成，而是来自两个不同作者的叙述。类似的还有在《创世记》6 章关于洪水的叙述等。

4) 这两部分文献存在着风格、措辞、思想和目的等方面的不同特征。这些不同特征表明这两部文献有着不同的作者和来源。在整个《创世记》中，“伊罗欣”文献在措辞和风格上与“耶和华”文献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例如在《创世记》第 1 章中，“伊罗欣”文献作者使用短语“地上的野兽”(beast of earth)，“地上生长植物”(earth bringing forth plants)，而耶和华文献作者则使用“旷野的众兽”(beasts of field)，“原野上的植物”(plant of the field)；“伊罗欣”文献作者反复使用“创造”(creat)，他提到上帝创造天地，创造大鱼，创造人；而“耶和华”文献作者则使用“造作”(form)，造作人和诸兽；伊罗欣”文献作者说“男人和女人”，耶和华”文献作者则说“男人和他的妻子”。在风格上，“伊罗欣”文献作者比较正式、冗长和重复，而耶和华”文献作者则简洁、活泼和流畅。例如《创世记》1 章中，同类型的短语出现了一遍又遍，《创世记》1:25 节，“於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创世记》1:27

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但《创世记》2：4节以下，则简洁、活泼、流畅。又如在“伊罗欣”文献，创6：18，比较详细叙述了上帝给予挪亚的命令，“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但在“耶和华”文献，《创世记》7：1节，仅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除了上述措辞和风格不同外，两种文献思想和视野的不同，更证其出自不同作者之手。“耶和华”文献作者常常提到前摩西时代的祭坛和献祭，但“伊罗欣”文献作者则对此一直保持静默，直到西乃时期，那里摩西正式确立祭祀规则。<sup>9</sup>

由于这些论证看上去都比较有力，所以阿斯楚克的文献资料假说提出后，被广泛地接受，阿斯楚克也因此声名鹤起。不过，最初这一假说的提出并不挑战传统的五经为摩西所作的权威，因为只要这个假说被限定应用在《创世记》上，就与摩西利用整合先前资料文献编纂《创世记》并不矛盾。但很快这一假说被应用到了五经的其他卷上，对五经的挑战接踵而至，并成为否定五经为摩西所做的利器。因为一旦全部五经由一些文献资料编纂而成，那么那些叙述摩西时代文献，一定成于后人，而将其编入五经则又在其后，所以五经必成书于摩西之后，非摩西编写。又据《出埃及记》6：3节：“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於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否定五经为摩西作者的学者认为，这段经文表明在摩西时代以前，耶和华的名字不为人知，先祖们亦无从知晓，由此可断定“耶和华”文献一定不早于摩西时代；更为可能的是它们形成于摩西以后的时代，且这些名字被广泛地置于先祖时代，表明耶和华文献势必是在“耶和华”名字被人熟知和广为流传时期成书，在这时作者无意识地将这些晚出的耶和华文献资料，当作列祖时代的文献错置于“伊罗欣”文献中。耶和华文献时代的错置遂导致了对其可靠性的质疑。学者进而认为诸如祭坛、献祭之类，在伊罗欣文献未见的叙述，很可能都是时代的错置，都是后人将自己时代东西放入了先祖时代。总之，耶和华文献的可靠性由此越来越受到质疑。

## 2. 残篇说 (Fragment Hypothesis)

在底本说兴起的不久，一个更激烈的假说被提出，那就是“残篇说”。与“底本说”主要关注《创世记》，强调其是由两个连续交替的材料构成不同，“残篇说”将关注的对象扩展到整个《摩西五经》，认为在五经中每一个段落或部分，几乎都有一个独立的源头。五经的编纂者所面对的资料不仅限于两个文本，而是围绕相关主题搜集了许多资料，它们有的可能就是一些残篇，有的则可能相对较大一些的完整资料。不仅如此，甚至有时两个或更多残篇资料是同一个来源。五经编纂者对这些零碎的资料进行采撷、辨别，然后将其放入一个合适的位置，并未顾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这一假说最早可能是由苏格兰神父亚历山大·格迪斯 (Alexander Geddes, 1737-1802) 提出，并主要是针对五经中的律法典章内容。他在《〈创世记〉-〈约书亚记〉导论》(Genesis-Joshua, 1792) 和其后《关于新译本的希来文校刊》(Critical Remarks on the Hebrew Corresponding with a New Translation 1800) 中，

---

<sup>9</sup> William Henry Green *The Higher Criticism of The Pentateuch*,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6, P61-71

认为五经中的律法典章乃是由长短不同的残篇构成，而不是来源于简单的文献底本。格迪斯的观点被后来的约哈恩·瓦特（Johann Severin Vater 1771-1826）等人接受，并在“底本说”基础上的发展，将“底本说”的基本论证吸收过来，构成对“残篇说”的支持。瓦特并提出了五经中，《申命记》（Deuteronomy）有别于伊罗欣文献和耶和华文献，提出了第3种原始文献D文献，并认为五经成书于大卫之后，其D文献成书于公元前621年或较早的一个时期。瓦特等人更进一步认为，这些谓的E、J、D文献亦是由不同的残篇构成。除此之外，五经还有其他长短不同的残篇资料构成。<sup>10</sup>瓦特的残篇说，得到了德·威特（De Wette 1780-1849）部分支持。德·威特被有的认为在五经批评理论发展史上具有奠基人的地位，他不仅论证了《申命记》成书在约西王时代，还认为《利未记》最早成书可能在所罗门时代，五经中最古老的部分源自大卫时代，后来编者利用这些残篇来辑成整本五经。<sup>11</sup>

残篇说解决了五经成书来源复杂的问题，似亦符合文献编纂的科学过程，但亦存在着一些致命的缺点和问题。首先如批评者指出的，残篇说者所析出的所谓残篇乃“完全是自我主观的判断”。因为很多的证据并不是确定的，更可能是主观的臆想而造成的错觉，如词汇、语法、韵律特征等。这些往往都是偶然的因素，如以此标准，不仅圣经，就是现代许多著作，我们都可以将之分为不同的作者来源，因为每一部著作几乎都可以找到页与页之间在用词、概念、语法等方面的不同。其次，无论五经或五经之外，并无材料说明，这些残篇曾经单独存在流传过。第三，作为一个来自不同地域的各种残篇的聚集只能形成一个不连接逸事汇编或杂乱的文集，而不可能形成一个像五经这样浑然一体、井然有序的紧密的整体。第四，五经拥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一贯的结构，在五经中不仅找不出残篇的痕迹，而且通篇结构中我们可看到相互依存，相互沿续连贯一致，明显非不同作者，相互独立的残篇所能为。<sup>12</sup>

### 3. 补充说（Supplement Hypothesis）

就在残篇说因着诸多问题遭到批评的同时，一种试图调和完善的假说又被提出，这就是补充说。这一假说的代表人物为布立克（Friedrich Bleek 1793-1859）、杜奇（Tuch 1806-1867）、斯塔赫林（Stähelin 1797-1875）、德·威特（De Wette 1780-1849）、挪贝尔（Knobel 1807-1863）等。补充说吸收了底本说与残篇说的优点，并对二者进行了修正，它既试图避免底本说过于整齐笼统，又试图避免残篇说对五经的无限切分，所造成文献切分的主观任意性。补充说保留了底本说中五经存在伊罗欣、耶和华文献的理论，但与底本说认为，二者是存在明显不同，并相互独立，被不同的人最终缝合在一起不同，补充说认为，伊

---

<sup>10</sup> “残篇说”者认为这些残篇可能通过诸如附在宗谱和律法典章前面的标题和标签识别。如创 2: 4, “创 2:4 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创 5: 1, “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出 6:16, “利未众子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后代记在下面。”利 7:1, “赎愆祭的条例乃是如此，这祭是至圣的。”利 7:11, “人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乃是这样。”诸如此类，每一个标记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单元，由不同的残篇资料来源构成。

<sup>11</sup> 参见 T. D. 亚历山大（T.D. Alexander）《摩西五经导论：从伊甸园到应许之地》，刘平、周永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11 页。

<sup>12</sup> William Henry Green *The Higher Criticism of The Pentateuch*,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6 P73-76

罗欣文献作者首先准备了他的底本，形成了五经的框架，也构成了五经的基础；较晚的耶和華文献作者，则在其基础上进行扩充；他相应地保留了较早的伊罗欣文献的形式、语言，仅将其引进、合并入耶和華文献中，并根据充分叙事的需要对其进行压缩、扩充，通过其所掌握的材料及他认为重要的对其进行添加补充。而这些添加和补充有的则有独立资料来源。在一这一点上则明显吸了残篇说的理论。

尽管补充说是在底本说与残篇说基础上的发展，要比二者更为完善，但其仍然有着一无法克服的难题。首先很难解释一个事实，既然伊罗欣文献在耶和華文献前已被完成，并被较好地保存下来，那么为何在伊罗欣文献中暗含着耶和華文献的内容或以耶和華文献作为其叙述的预设。其次，这一假说的重要依据是，之所以承认耶和華文献与伊罗欣文献作者的存在，耶和華文献补充了伊罗欣文献，是因为二者存在着风格与思想等方面的不同，并据此将其区分开来。这也就是说，耶和華文献作者较信实地保存了伊罗欣文献的内容，耶和華文献作者的独特性仅表现在他自己的部分。然而，我们发现，在事实并非如此，在伊罗欣文献中经常有耶和華文献所特有的思想或措辞。因此，我们有必要承认耶和華文献作者并没有忠实地抄录伊罗欣文献的原文，而是改变了它的语言，插入了他自己的思想和表达。另外，在耶和華文献中，也存在着一些伊罗欣文献中所有特有的风格和思想，这被补充说者解释为耶和華文献作者在补充伊罗欣文献时已尽可能地仿效了伊罗欣文献的风格和承继了其思想。又补充说者认为，耶和華文献与伊罗欣文献存在显著的区别，但事实是伊罗欣文献与耶和華文献界线往往很难划分。对此补充说者解释是，耶和華文献作者在补充伊罗欣文献时采用了高超的技艺，以至使二者浑然一体无法辨认。对于这些解释，反对者认为，除了这些解释与这些假说相抵牾外，补充说为避免困难结果产生了一个更大的困难，用一个经不起检验的假说来支持另一个假说，每个新的添加都制作了一个更加脆弱的上层建筑。在一个时候，承认伊罗欣文献与耶和華文献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耶和華文献作者忠实地保存伊罗欣文献，并不关心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差异，而另一个时候，又说耶和華文献作者修定了伊罗欣文献的语言，并仔细摹仿伊罗欣文献，以便所补入的内容与其相一致，显然这一矛盾是无法解释。这就是如同我们假定一个人，一方面毫无技巧，一方面又技艺高超，一方面作为一个忠实的报告者，一方面又是精心构思的窜改者，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一假说也是很难成立，缺乏坚实的依据。<sup>13</sup>

#### 4. 晶体说 (Crystallization Hypothesis)

比较简明是补充说的优点，但不足以让那些主张分解圣经的批评家释怀。为解决补充说一些无法解释的难题，在补充说的基础上，晶体说便应运而生。这一假说的代表人物是伊华德 (Heinrich August Ewald 1805-1875)。1823 年伊华德的著作《〈创世记〉的写作》(*Die Komposition de Genesis Kritisch Untersucht*, 1823) 问世，旗帜鲜明地反对残篇说极端分割五经的作法。20 年后，1843 年他又出版了《以色列人历史》(*Geschichte des Volkes Israel*,

---

<sup>13</sup>William Henry Green *The Higher Criticism of The Pentateuch*,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6 P80.

1843) 提出了自己的假说, 这一假说被称为“晶体说”。这一假说是补充说的一个修订, 它将原一次性的补充, 加增到不同时期的数次补充, 最终形成一个整体。伊华德认为, 五经的内核或最古老的部分由四个原始的叙事构成, 现在仅以残篇的形式深嵌在五经底层, 后来的叙事都是围绕着它们不断地累积。围绕这些核心叙事, 大约先后经历了五次的层层增补修改, 最后的作者在先前作者的基础上, 加上自己的增补和修改, 将之整合成一个连续完成的整体。然后, 《申命记》作者在此基础上创作了《申命记》, 并将之与先前叙事, 整合一个连续的整体。经过数百年的层层增补和修改, 五经最终形成目前的规模, 一个巨大的连续的聚合体, 包含了数百年间不同的增加的内容。<sup>14</sup>

#### 5. 修订文献底本假说 (Modified Document Hypothesis)

又被称新底本假说。如果结晶说, 仍没有跳出补充说的羁绊, 那么赫尔曼·胡培辉 (Hermann Hupfeld 1796-1886) 则走出了补充说的阴影, 又重新回到了文献底本说上来, 并对其做了新的修订。胡培辉继承了伊尔根 (K. D. Ilgen 1763-1834) 的观点, 认为《创世记》中有两种伊罗欣文献资料。在 1853 年, 胡培辉出版了《创世记底本》(Die Quellen der Genesis) 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理论。他力求建立两个事实: 一是耶和華文献不是一个不相连的添加到先存底本上的文献, 而是一个连续的独立的文献。为证明耶和華文献连续性, 他甚至不惜从伊罗欣文献中抽取内容来弥合耶和華文献的断裂。二是坚持伊罗欣文献不是一个完整的文献, 而是由两个文献构成。对一些既没有伊罗欣文献的特征, 也没有耶和華文献特征, 而显示两者融合的棘手段落, 胡培辉认为, 他们属于第三作者的作品, 他使用“伊罗欣”的名字, 却具有耶和華文献措辞和其他特征。胡培辉将这些段落称为第二伊罗欣文献。胡培辉认为《创世记》1-19 章属于中的伊罗欣文献材料属于第一伊罗欣文献, 20-50 章中的伊罗欣文献材料除 23 章和其他一些零星内容外, 绝大多数属于第二伊罗欣文献。由此, 在胡培辉的新底本假说中提了三个底本, 第一伊罗欣文献底本, 第二伊罗欣文献底本和耶和華文献底本。这三个底本再经过一个编者根据他自己的考虑进行穿插、删节、修改、调整 and 合并, 最终形成了目前的样式。而目前五经中所存在的问题, 正由于编者的水平等原因造成的。

对胡培辉的观点, 反对者亦给予了有力的批评。首先, 以 19 章末为第一伊罗欣文献与第二伊罗欣文献切分点, 过于紧促、突兀。在这之前的所有伊罗欣文献归第一伊罗欣文献, 之后除少数章节外都归第二伊罗欣文献, 这看上去更像是对一个连续的文献的武断切分, 而不是将编辑者编辑的各部分有效地分离。其次, 既然第二伊罗欣文献与耶和華文献交织在一起, 在一些段落中它们是如此密不可分, 我们已不可能建立一个清楚明确标准诸如语言、风格或者思想来区分它们, 那么我们将之强加区分, 很可能是主观的, 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我们这种划分。且即使第一伊罗欣文献与耶和華文献、第二伊罗欣文献在语词、风格上有明显的区别, 但与第二伊罗欣文献相比, 第一伊罗欣文献是较少的。也就是说, 证据是很弱的, 而建立在这样的证据之上的结论显然有些苍白, 并不能说明差别的真正存在。第一伊罗

---

<sup>14</sup> William Henry Green *The Higher Criticism of The Pentateuch*,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6. P81-82.



欣文献都被限定为宗谱、传奇和诸如创造、洪水或独一的宣示（如生、死、年代、迁徙等）等非常事件的内容，实质上，对这些特殊内容的叙述用不同的词汇是正常的，而只有当描述同样事件时，我们说用同样的词汇才是可能的。第三，这一假说将五经中所存在的“重复、矛盾”等问题归给了五经的编辑者，但与补充说存在的问题一样，如前文所指出的，这一假说也无法解决，编辑者在一个时候忠实地保存先前的文献，并不关心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差异，而另一个时候，又仔细认真处理自己面对文献，对其进行修改、加工、润色等，这一矛盾。<sup>15</sup>

#### 6. 格拉夫——古宁假说（Graf-Kuenen Hypothesis）

综合以上诸说，我们说，虽然它们观点各自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试图解决五经文本构成的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多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不同的资料来源上，特别是《创世记》的资料来源上。它们都代表了一个科学理性的方向，正是沿着这个方向前进使得五经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然而，它们也有着共同问题就是，尽管历史问题在诸说偶有提及或潜在地存在，但很少有学者认真思考或明确地对待这一问题，这就造成了其理论的出发点，不是在坚实的历史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一个假想之上，因而在反对者面前很难立得住。这一问题直到格拉夫（Karl H. Graf）出现才真正被关注，但之后又再次沉寂。

1866年，格拉夫（Karl H. Graf 1815-1869）在其著作《旧约的历史书》（*The Historical Books of the Old Testament*）提出了著名的“格拉夫假说”。在胡培辉的基础上，格拉夫亦将五经分为四个部分，并对其成书的先后秩序和具体年代发表了看法。格拉夫将胡培辉的第一伊罗欣文献连同利未的律法和相关文献都视为祭司文献，即所谓的P文献。格拉夫最初的主张跟前人的主张虽就有所不同，但亦有许多相近的地方。他最初认为《创世记》中的P典文献是一个“主干”。J文献作者在其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因此，J文献要P典之后。但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利未记》中的礼典要在J文献之后，这样他被迫将P典分裂成两个部分。后在古宁（Kuenen）的批评建议下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将P典作为一个整体最晚出的文献，置于J、E、D文献之后，大约在流放后时期。耶和华文献，即所谓J文献最古老，应始于公元前9世纪；伊罗欣文献，即E文献，略晚形成，约公元前8世纪，申典文献，即D文献是在先知约西亚改革时期，大约出现在公元前621年前后。

格拉夫的假说提出后，得到了荷兰学者古宁（Abraham Kuenen 1828-1891）教授的鼎力支持，古宁并在其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假说，并将这假说命名为“格拉夫假说”。但由于用于支持这一假说的证据都比较脆弱，因而尽管为一些学者所知，但一直没有在西方圣经学界产生多大影响，直到威尔浩森的出现，这种状况才发生根本的改变。<sup>16</sup>

### 三、威尔浩生与五经的历史批评

<sup>15</sup> William Henry Green *The Higher Criticism of The Pentateuch*,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6. P85-88.

<sup>16</sup> W. R. Smith. *Preface.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Israels*, Gloucester, Mass., Peter Smith, 1973, Pv-vi.